

第三章 旅居達蘭薩拉藏族文化變遷的適應問題

前一章中，一些有關文化變遷的重要趨勢已經被突顯出來，本章將轉到文化適應問題進行分析與討論。於本章的第一節中，我將描述人口地理學上的轉變，在這個過程當中，我的焦點是當地藏族流動性的生活與季節性的變化，印度人口與藏族之間的關係也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在第一節中將對這個問題做剖析；再來，將會進一步地探討新來的藏族與長久居住在印度的藏族之間的差異；接下來的部份將分類與分析外國人的身分，外國人與藏族之間的互動與交流很頻繁，以下將會探討這兩個文化群體之間的對話對彼此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下個部份，我將討論達蘭薩拉的藏族如何運用印象操作的策略，比如在制度性與人格層面便是海外藏族適應於達蘭薩拉的生活之重要策略；最後，我將針對達蘭薩拉社會的另一個重要趨勢進行討論，也就是遷移到先進國家的增加。遷移到國外的狂熱應該被視為很多不同因素造成此現象之增長或累積的自然結果。前幾章都是討論更為廣泛的概念與現象。在本章當中，筆者將盡力配合達蘭薩拉的獨特節奏而突顯出一般藏族如何適應於日常生活多變的挑戰。

第一節 人口的流動與轉變

最近四十年以來，達蘭薩拉的人口狀況經過了巨大的轉變。早年藏族流亡者剛到了印度的時候達蘭薩拉是一個貧困的難民營，至今這個小村莊已經變成了海外藏族的首都，而且也是五千多個藏族的居住所在地；不過，多數的居住者並不是全年都在達蘭薩拉過日子，為了宗教、經濟和其他的理由很多人常常流動到印度半大陸各地，部分活動範圍比較廣的藏族平常也旅行到世界各國去。生活在達蘭薩拉的藏族要面對非常現實的生存問題，以印度的標準來看，達蘭薩拉的生活費非常的高。拿我的認識的年輕藏族當一個例子，在餐廳工作的他每個月可以賺兩千盧比左右，光是付房租，他一個月要花一千多塊，剩下來的錢幾乎付不出食物、衣服跟日常用品的花費，而且他連存一筆錢的可能性都無法考量；看得出來，雖然部分的達蘭薩拉藏族跟他們印度的鄰居比起來富裕許多，但是，對很多當地的藏族卻連最基本的生活條件很難達到，事實上，為了達到基本需求許多藏族不得不依靠藏族親戚朋友與外國資助者的協助。對達蘭薩拉的藏族來說，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謀生之策略就是季節性的遷移，上面已經提過，海外藏是全球的族群中流動率最高的族群之一，達蘭薩拉的藏族並不例外，這個流動人口是達蘭薩拉的一個很重要的特色，這個現象對當地藏族文化的影響也非常的可觀。在本節將進一步的分析與討論。

藏族到了達蘭薩拉以來，當地的印度人口也經過很大的轉變。原來的居民多數依賴於半游牧式的傳統經濟模式，後來隨著觀光的发展越來越多居民轉成觀光

業的經營者。最近二十年，本地觀光市場的爆發也吸引了很多外地來的印度人到達蘭薩拉作生意，吸引許多來自達蘭薩拉附近村莊前往此地尋找工作機會。有很多來自於更遙遠的地方，如喀什米爾與比哈(Bihar)的印度人，也都聚集在達蘭薩拉的市場裡，看得出來，達蘭薩拉的印度人口與藏族人口一樣既多元化又複雜，並且一直在變化當中；觀光業的發展也刺激了達蘭薩拉的經濟狀態，對印度的居民也帶來了很多機會與利益，但是來自國外的觀光客對藏族給予的同情、友善與經濟機會則遠遠超過當地印度人所受到的待遇；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印度人對藏族的嫉妒與敵視是不可避免的。達蘭薩拉印度人口的轉變與這些來自印度各地居民及藏族之間的複雜關係，也是本章很重要探討的對象。

最後，本節將分析達蘭薩拉藏族人口中兩個獨特的群體；上一章已經提過“舊人”與“新來者”這兩個群體的重要性，在此讓我們來進一步了解他們的過去與轉向。舊人指的就是早期跟隨達賴喇嘛一起逃亡印度的藏族，這個群體也包括原來流亡者出生在印度的後一代；所謂的新來者指的是 1980 年以來逃往南亞的藏族。自從那時以來，隨者中共寬鬆的民族政策，一波一波的藏族趁機逃往尼泊爾與印度，到現在每年兩千多個新來的藏族都會經過達蘭薩拉藏族的招待所(Reception Center)。¹顯然地，兩個群體之間存在著一個很大的鴻溝，如語言、教育、社會化等差異。如果可以更仔細地分析兩者在過去與轉向之間的關係，則有助於突出達蘭薩拉藏族人口的轉變與多元性。

一、季節性的變化

短暫性與流動性等觀念運用在描述達蘭薩拉的特殊狀況實在非常的恰當，只要簡單地討論當地藏族移動與流動性很高的生活模式，上面的論點就會被突顯出來。除了部分在政府、學校、手工藝品工廠等地方工作而收到穩定月薪的人以外，大部分的藏族生活在季節性經濟的壓力之下。筆者的藏文老師曾跟我這樣說過：「我們藏族住在達蘭薩拉要想很多不同的賺錢方式才可以待下去」。²對很多人來說，隨著季節而離開也是重要的生存手段。這位老師也在跟我講了這句話的兩個星期後就搬離達蘭薩拉。那時候，被迫重新找尋另一個藏文老師讓我開始了解到藏族常期居留在達蘭薩拉的困難度，後來使我養成了坐在路邊的小茶館看路人來來去去，進行非正式人口調查的習慣，我親眼看到，秋天的人潮隨著冬天寒流而漸漸的消失了，到了春天市場通路又熱鬧了起來，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潮又回到了達蘭薩拉的懷抱，過了不久，又看到了我心愛的老師走在路上。

簡單地來說，達蘭薩拉的旺季從九月中印度的雨季結束之後便開始了。從九月到十一月達蘭薩拉的市場充滿藏族、印度人與來自世界各國的觀光客。十一月後，山上的天氣逐漸變冷，大部分的觀光客往南方走而離開達蘭薩拉。從十二月到二月中走在路上的人變得很少。到了二月中藏族的新年會吸引很多人再度上山而回到達蘭薩拉。到了三月，又恢復了熱鬧的畫面。一直到七月雨季開始，達蘭

¹ Meredith Hess, "Statelessness and the State: Tibetans,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Activism in the Transnational Worl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41.2 (2006): 84.

² 10 月 21 日，在他的客廳裡，她如上描述了他經濟困境。

薩拉的民宿、餐館與商店都充滿了人。到了雨季，多數的人又因為不舒適的陰冷天氣而前往其他的地點。

在接下來的幾頁，讓我們來更進一步的探討季節性的人口流動這個問題。在離開的人往哪一些地方去？他們到外地後又會做什麼事？淡季的時候誰會留下來呢？這種高度的流動率對當地文化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以下，我將透過我自己所觀察到的現象而討論這幾個問題。

對我的朋友Lobsang和Tashi來說，秋天的時候生意還不錯。有川流不息的觀光客來到達蘭薩拉，他們教導藏族烹飪的課程常常是爆滿的狀態，在旺季的時候，每個星期上六天的課，一天兩次，一堂課最多有十個學生。³對我的藏文老師而言，秋天也是一年之中的旺季，從九月到十一月，他的課程總是排的滿滿的，早中晚都有課，他主要的收入來自於家教，在秋天這段期間他也教授從美國來的團體學生。⁴在市場上，在路邊賣小吃或者紀念品的攤販，生意也挺不錯。我的其中一位朋友在四年前從青海來到達蘭薩拉，他在市場路上販賣著紅燒肉、烏龍茶等從中國來的產品賺取微薄的利潤⁵，這些產品當然不符合西方觀光客的胃口，但總是有夠多想念中國口味的“新來藏族”為這些商品捧場，可以想像十年以前，藏族激烈杯葛中國的商品，當時的中國商品在市場上可以說是鳳毛麟角，然而中國產品的普遍性可以證明上一章提的論點，當今反中國情感的強度已經慢慢在淡化當中。對剛剛提到在達蘭薩拉的各项職業，秋天可以說是獲利的季節，他們可以賺取足夠的錢財抵銷平時的消費，並且很多時候可以存一點多餘的錢用在其他的季節。

在十一月結束時，走在路上的觀光客越來越少，往德里、德拉頓等等其他城市的巴士是客滿的，每個晚上，這些即將離開的人還有送行的朋友聚集在上達蘭薩拉擁擠的、泥濘的泥土路上，這樣儀式性的畫面已經變成了生活在達蘭薩拉一種固有的模式，藏族人與觀光客（值得一提的是印度人很少參與）陪伴著他們的朋友與親戚並向他們道別。哈答（儀式用的圍巾）將掛在離別者的脖子上，並且交換著擁抱與拍照。當我在十一月底時離開達蘭薩拉將上巴士時，我身上就掛著朋友們送的八個圍巾。人潮來來去去就是達蘭薩拉最突出的特色，以上的現象是當地人面對這些流動的人們經常性的反應。

當我離開了五個禮拜後，在一月時再次回到達蘭薩拉，我幾乎認不得這個地方，一半以上的商店關起來了，大部分的攤販早就離開城鎮，觀光客的人數從好幾千個剩餘僅僅五十人左右。大部分的觀光客外出尋找更舒服的氣候，很多依賴觀光業的藏族商人也移動到印度其它的許多地方，其餘有經濟能力的藏族，跑到佛教的朝聖地過冬（當我在達蘭薩拉的那一年，遠在南印度時輪金剛

³ 一個人上要一百塊盧比，假如客滿的話，扣掉材料的基本預算之後，上一次課可以賺四百多塊立盧比。

⁴ 這位老師一個小時的藏語課算一百塊盧比，後來我又找到更好的老師一小時只要五十盧比。

⁵ 他向我解釋，每年淡季時，他到尼泊爾去買這些產品，這已經變成了一種普遍的現象，許多達蘭薩拉藏族都趁淡季到尼泊爾買便宜貨，到了旺季時再回到達蘭薩拉賣，重要提及的是，沒有護照的藏族跨印度與尼泊爾的國界必須將賄賂給警方，這樣，這是一種風險性相當高的經濟活動。

(Kalachakara)的講授吸引了數千位當地的居民)，有趣的現象是，宗教與商業的高潮經常同時發生，當這些川流不息的朝聖者停留之地也提供了商人在經濟上的機會，只有非常少數的觀光客逆向操作，在這寒冷的氣候停留，留下來的還有許多當地的印度居民、少數老一輩的藏族跟沒有經濟能力旅行之「新來者」。結果冬天在達蘭薩拉是我八個月當中最舒服的時光，圖書館設施在冬天關閉，免去了每天埋頭文件與論文中的日子，我花了許多時間學習藏文，並且與我的藏族朋友單純的相處。

到了二月中旬，市集上的熟面孔開始出現，預期中的外國觀光客涓流不斷的加入藏族新年與達賴喇嘛的教授，然而最引為氾濫的是數千人的藏族很快地擠滿了小小的達蘭薩拉，更多的訪客從南亞或世界其它角落不同社區與城市湧來。對藏族而言，藏族新年(Losar)季節有著重要的象徵，尤其是對於流亡到異鄉的藏族有著重申其原本藏族身份且團結的意義，二月底與三月初這段期間，市場上人潮中藏族佔多數，新年本身，緊接在三月十號起義之日以及傳召(Monlam)教授給予了藏族一個聚結並且共同的集體意識，散落在世界的藏族會在這個時候團圓並且親近達賴喇嘛，儘管激烈國族主義氣氛比以前淡，這一段時間仍是海外藏族凝聚團結力量的重要季節。新年是親友間聚集社交、飲食與歡笑的節日，這是一個巡禮主要廟宇的時刻，並且舉行許多宗教的典禮，期待以此迎接接著一年的好運與希望，更多的是，新年也是藏族經濟來源的大好機會，此刻，藏族賣著自己的商品給其它的藏族，我們看到了這個常是依賴外來慷慨資助的藏族經濟自主的可能性。

三月初，數千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客參加達賴喇嘛年度的講法，在下個階段，我將討論並歸類這些從不同地區遠道而來達蘭薩拉的外來群體。法會之後，人潮逐漸散去，這些啓程離開的觀光客空檔很快地被從南印度來避暑的背包客所取代，這樣的時刻達蘭薩拉再一次爆滿了人潮，當擁擠的人潮將市場小徑擠的水洩不通時，讓我不禁聯想到台灣的夜市…。藏族的商人、老師、藝術家等其它職業利用這個大好時機在這觀光客的旺季海撈一筆，一年四季中實在良機苦短，幾個月後由於氣候的改變，許多藏族居民再一次打包出發前往其它地點，原因也許是出自於選擇或者經濟上的短缺，然而，達蘭薩拉藏族已經適應於短暫性與流動性的生活模式。

二、變化中的印度人口

在以上對於達蘭薩拉季節性的描述，有個族群很明顯的在我的分析中缺席了，那就是當地的印度居民，接下來的幾頁，我會試著彌補這個疏漏並且深度的分析這個族群。經濟上的比較當中，藏族比印度居民成功許多，雖然許多的印度居民也因為觀光客人潮的湧入而受益，但是藏族致富招來的怨恨經常出現，這種憤慨主要的催化劑是來自於外來世界對於藏族的種族偏袒、同情、興趣、禮物並且長期的資助壓倒性的提供給藏族而非印度族群，如以上所提，成群的觀光客來到達蘭薩拉，許多是逃避在印度旅行時所承受的壓力，有趣的是，在許多觀光客

的想法中，與藏族人來往是與印度人往來的經驗截然不同地，當印度人被當作是不誠實的、奸詐的、骯髒的人種時，藏族人卻有著誠實的、正直的並且乾淨的形象，結果，當選擇客房、餐廳、與商店時，像這樣對民族的刻板印象深深影響著觀光客做決定的準則；有天早上我與一個印度籍的男孩對話，他簡潔地表示了對這種現象的不滿與忿忿不平，當我問他對藏族人的觀點時，他回答說：「我不喜歡他們，他們總是跟外國人說我們印度人很壞，這是我們的家，藏人不應該這樣批評印度人」。⁶

印度人對藏人的忿恨在於藏人在管家、餐廳或飯店顧用印度少男少女更加速增長，這些少年許多是來自比哈(印度最貧窮的地域之一)，被引來做人力的勞動。有個藏族經營的意大利餐館顧用了十來個印度小孩煮菜、洗碗、當服務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同樣的餐廳裡，我看到佈告欄中刊登徵求外國人的志工來管理廚房的訊息，這樣的實例說明了在達蘭薩拉不同民族間的偏坦情形是十分錯綜複雜的，有些藏人大刺刺的利用外國人對藏人正面的文化形象並且同時剝削印度孩童的勞工⁷，難怪印度人與藏人之間會有種族上關係的緊繃。

英國在一八六零年代首次底達以前，達蘭薩拉這個地方是 Gaddi 族的家鄉，他們是季節性的游牧民族；一直到現在，Gaddi 的女人仍舊扛著大捆的飼料，聚集在達蘭薩拉附近的山坡，飼料在他們回家後被當做燃料使用。部份當地的 Gaddi 居民已經適應達蘭薩拉現代的情勢，巴克蘇與德蘭卡特這兩個在達蘭薩拉外圍的小山莊，是印度人在觀光市場上立足的最佳例子。

大約在印度獨立之時，英國人從這個區域撤退之後，許多安頓在山脊上的印度人也同時移居到其它的地區。許多回教的居民搬往巴基斯坦，有些印度的富裕人家夏天時在達蘭薩拉附近的山丘避暑再回到德里。⁸在早期，藏族的流亡者定居在達蘭薩拉對於這個區域的印度人口結構只有一點點的衝擊。接著，因為達蘭薩拉不停成長的觀光市場吸引了印度其它地方的人潮來尋求經濟機會，當更多的印度人抵達，不管是藏人或者印度官方都擔心著在有限的經濟資源上的競爭將會導致雙方民族之間更多的緊張。⁹

二十幾年前，在他的對南印度的一個安置區的研究中，Goldstein 指出避免與印度人產生對於有限資源的競爭是當地海外藏族維持文化邊界的一重要策略，據他所說，這方面的政策很成功¹⁰，在達蘭薩拉這方面的政策比較複雜，McGluckin 的博士論文中提到，印度與流亡藏政府試著減低並限制衝突產生的影

⁶ 3月18日，在離達蘭薩拉藏族兩公里左右的森林中，一個十三歲的印度男孩提供了以上說明。

⁷ 筆者的房東，一個上了年紀的藏族婦人，用藏文向我表示她對於這種現象的看法，以下是我的翻譯：「這些年輕的印度跟藏族家庭一起住這一件好是，這對這些印度小孩很好，從中他們可以學習，如果勤勞與努力工作的，就會有一個很舒服的生活，要不然這些印度小孩會到處作壞事，他會有黑色的想法」，2月12號房東像筆者提出如上的觀點。

⁸ Keila Diehl, *Echoes from Dharamsal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41.

⁹ E.A McGluckin, "Postcards from Shangri-La: Tourism, Tibetan Refugees,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Ph.D. dissert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7), 254.

¹⁰ Melvyn Goldstein, "Ethnogenesis and Resource Competition among Tibetan Refugees in South Asia: A New Face to the Indo-Tibetan Interface," in *Himalayan Anthropology: The Indo-Tibetan Interface*, ed. J.F. Fisher (Paris: Mouton, 1978), 411.

響，鼓勵族群上的分工¹¹，其實，傳統上許多服務業被印度人壟斷，在達蘭薩拉，成列的水果與蔬菜小販是被印度人獨佔的產業，有趣的是很多小販能夠說很流利的藏文，其它服務業的部門如計程車站、旅行社、雜貨店、網路與電話設施等也穩固的受印度人的控制，藏族在市場的觀光業上只受限在開餐廳以及賣一些手工藝品或五花八門的裝飾物。但是，當觀光經濟持續的成長卻在藏族與印度人間的財富上有著不相等的分配，這樣經濟上直接的競爭越來越常見，一大群在一九九零年代抵達達蘭薩拉的喀什米爾人就是這個現象最好的例子，喀什米爾人帶來從家鄉製作的地毯、手工藝品、與藝術品建立他們自己的系統，將他們的商店放在事先藏族獨有的市場勢力中，按照McGluckin 的說法，在一九九三年時，在上達蘭薩拉只有一個印度的商店賣印度的東西，現在你可以找到許多藏族人、喀什米爾人或著印度人開的混和著各式產品的商店，也不難發現喀什米爾人賣著藏族人的畫或著藏族人賣著喀什米爾人製的地毯，在這種混雜而成的經濟環境，政策與安排很難避免直接競爭的產生。

1994 年時，在達蘭薩拉的印藏關係達到最緊張的時刻，四月二十二日時，幾個印度與藏族年輕人之間的吵架中，一位印度人遭到刺刀身亡，這個事件的訊息傳到當地的印度民眾之後，大規模的騷亂爆發了，據說當地印度人成群的到處洗劫藏族的商店、打破窗戶與毆打藏族民眾等等¹²，當地的藏族媒體指出民眾的暴動發生在一些印度的政客的煽動之下¹³，緊接在這次暴動發生之後，為了避免更多暴力的挑撥，達賴喇嘛提議流亡政府可以移到南印度去，一群比較冷靜的印度商人擔心達賴喇嘛與其他的藏族到外地遷移對達蘭薩拉的經濟會造成嚴重影響，因此，在印度社區的領導者懇求達賴喇嘛留下來的情況之下，藏族最後決定不離開達蘭薩拉，不過，這次的暴動向藏族社區傳達的訊息很明確，許多印度人隨時都有可能再爆發。¹⁴

摒除種族上的緊張，我在達蘭薩拉的時光，藏族人與印度人之間的關係大多是真摯良好的，但僅限在公開市場間的互動關係，私底下並沒有太多的交流；然而，印度商店的牆上總是掛著達賴喇嘛的照片，這種現象表示，藏族與印度之間是一種愛恨交織的關係，印度的商人深知藏族刺激了達蘭薩拉的經濟市場，反過來看，經濟上的競爭與外國人對於藏族的偏愛這兩個因素卻製造著雙方敏感且不穩定的狀態。

三、舊人與新來者

重要的一點是，在達蘭薩拉的衝突不只存在於印度人對藏族人，來自不同背景的印度人彼此之間也有所不悅，一個喀什米爾的計程車司機就曾經向我報怨受到當地計程車組織的歧視，他抱怨本地的印度人心胸狹窄、無知並且貪婪。可以

¹¹ McGluckin, 269.

¹² Diehl, 120.

¹³ K. Dhondup, "Dharamsala Revisited: Shangrila or Sarajevo?," *Tibetan Review* July (1994): 15.

¹⁴ 今年 4 月 9 號又發生一次印度人成群毆打藏族的事件，據phayul.com(05/01/2007)的報導三十五個印度的計程車司機聯合毆打了四個藏族，這是 1994 年，最嚴重的印藏之間的暴力事件之一。

預見的是，很多當地的印度人對喀什米爾人也有類似的批評，在印度這個高度多元化的國家中這樣的衝突是不難理解的，對於藏族本族之間所存在的裂縫就應該感覺意外嗎？許多研究中指出藏族與外國人之間複雜且具爭論性的關係，但鮮少的文獻有探討到藏族本族內在發生的衝突。前幾章已經提過，地方意識與高度多元性是了解藏族史關鍵性的重要概念，因此，在進行下一節討論外國人在達蘭薩拉扮演的角色之前，讓我們先看看藏族人口中，最近幾十年發展出來的兩個獨特群體；接下來的幾頁，將探討所謂的舊人與新來者兩個團體歷史上的狀況與體驗，如此一來，可以更了解藏族間的衝突與多元性。

在一九六零年代早期的藏族，他們來到一個非常貧困且缺乏基本建設又不穩定的難民營，很多藏族人在造路等其他勞工階層的領域謀生，他們甚至在印度的村莊裡當乞丐乞討。提供資料者表示雖然當時遇到經濟上的困難，然而他們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團結的，換句話來講，共同的渡過困難也是凝聚團結的重要因素，過了二十多年後，一波波新來的藏族又從中國的西藏開始流亡到尼泊爾與印度。這些“新來者”總會經過達蘭薩拉的招待所，其中有許多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實現一輩子一定要見達賴喇嘛一次的夢想。他們來到達蘭薩拉所見與一九六零年代的舊人時期所見的已完全不同，他們看到的是一個發達的熱鬧的小鎮，原本的藏族居民可說流利的英語與印度語，他們在印度已發展出一個完整且廣泛的人際網絡，新來的藏族也帶來不同的語言、教育與不同的文化背景。

當新來者來到達蘭薩拉時，原來待在這裡的藏族給予非常熱情友善的接待¹⁵；但是，更多的新來者抵達時，卻開始了一些新舊間衝突的案例，根據那些一九八零年代就待在達蘭薩拉的藏族提供的訊息，有些新來的“壞人”他們偷東西又喜愛製造糾紛，事實上，在流亡社會之中，很多人將問題歸因於“壞人”的不端行為，這樣的解釋會覆蓋這兩個族群之間真正衝突的因素。第一個主要的問題是很實際的，藏人該如何對應如此多湧入達蘭薩拉新來者的物質需求？當新來者抵達時，有更多人搶奪原本就很有有限的資源。第二點，藏族人本身對於自我的認知產生迷惑，哪一個團體才是真正的藏族呢？是那些已經漢化不過在西藏土生土長的新來者或是好幾十年以來與印度人跟外國人密切接觸的長期居民？接下來的幾頁，將探討這兩個群體中不斷變化的關係與人口上的轉變。

我認識的一個新來者 2004 年來到了達蘭薩拉的時候，他跟當地藏族談話時連最簡單的溝通都很困難，他來自於四川康區的小山莊，其他地方來的藏族聽不懂他家鄉的方言，他所面對的情境並不是例外，上一章已經深入地討論過語言在達蘭薩拉的使用狀況，到達達蘭薩拉的時候這些新來的流亡者要面對嚴重的歧視，當地的藏族把他們視為漢化、無文化水準，教育程度低與教養不佳的難民。¹⁶的確，很多新來者缺乏教育與專業，他們的風格，包括講話、走路、穿衣服等

¹⁵ Amy Montcastle, "Tibetans in Exil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Identities" (Ph.D. dissertation, Macalester College, 2006), 152.

¹⁶ 有趣的是，長期在達蘭薩拉居住的「新來者」對最新的「新來者」也會養成負面的刻板印象，一個已經在達蘭薩拉居住五年的康人向我表示，最近到達達蘭薩拉的藏族教育程度很低如同犏牛(Yak)一樣。

與當地長久居民比起來的差異實在非常大，並且達蘭薩拉以觀光為主的整個經濟體系已經被當地藏族與印度人所壟斷，所以連受過教育的新來者都很難找到立足之地。剛來達蘭薩拉的前三十天左右新來藏族住在為他們設計的招待所(Reception Center)，接下來，留下的小孩被分批到流亡藏族教育體系的各個學校，從十八歲到三十歲的成年人也有機會受教育與訓練，他們可以選擇往離達蘭薩拉八公里之遠的“轉換”學院(Transit School)。

此學校專門教授英文、藏文與各種專業給新來的流亡者，好讓他們能夠適應印度的異國環境，遠離達蘭薩拉不但泛政治化，且又十分在意形象的環境，這個位於偏僻田園之地的轉換學院也是將新來者重新教育與社會化的理想之處，在該學校學生除了受到最實用的訓練以外，也同時被灌輸流亡藏族對於藏族史、藏族文化、西藏現況等問題的官方說法。有趣的是，當我在流亡政府的教育部詢問轉換學校是否缺乏義工的英語教師的同時，我發現了本校並不使用外國來的師資，教育部的員工很有禮貌並婉轉的建議我可以到附近的小學當義工。

有天下午，該學校的畢業生帶我回去他的母校探望學子，當天我花了一個很悠閒的下午坐在小溪流旁用中文跟當校的學生聊天，那天唯一不愉快的記憶便是教師與行政人員對我投射既冷酷又不屑的眼光，好像他們不希望有外國的客人在校園內出現似的。藏族的官員為何刻意的將轉換學院的環境置身在外國人的視線之外呢？以上已經花了不少篇幅討論神秘化與理想化的形象這個問題，達蘭薩拉藏族擅於使用這些形象，而且這些形象主要的對象是西方，剛剛從西藏來的藏族在印象操作這方面並沒有經驗¹⁷，並且大部分的人從來沒有接觸過西方人，他們的行為舉止也許不像理想中的藏族，或許這些住在轉換學院的新來者與官方流亡藏族理想中的好藏族形象是不互相符合的，將他們隱藏在在外國人關注之外，有助而理想化形象的維護。

如以上所提這個問題也牽涉到藏族本身的自我認同，反漢的情感也許正在降溫當中，不過達蘭薩拉藏族聽其他的藏族說漢語卻聽得十分刺耳，對當地許多藏族來講，漢語的使用等於藏族真實性的流失，反過來看，在許多新來的藏族之觀點，藏英印三種語言的混雜使用表示長期居留在印度的藏族也失去了真正的藏族文化，結果，兩個受過不同異國文化影響的團體之間在爭取真實性(authenticity)。不過，在達蘭薩拉國際化的環境中，西方文化的吸引力至高無上，這樣的情況之下，學好英文是新來者在轉換學院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好讓他們可以跟得上西方化的潮流。

許多我認識的新來者約經過長達三年的時間轉換學院的訓練才搬移到達蘭薩拉，但是在有限的資源與機會之實際情況之下，達蘭薩拉要吸收新的居民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前一章已經提過，1994 年以來，受教育後新來的藏族被流亡政府鼓勵回西藏去，按照官方的說明，這種政策以西藏內地的文化保護為目的¹⁸，不過，比著認為這個政策也有更現實的一面，達蘭薩拉的經濟已經飽和，發展的

¹⁷ 有關印象操作的討論，參看本章的第三節。

¹⁸ Hess, 82.

空間極有限，新來的藏族難以在達蘭薩拉找到立足之地，我認識的新來者多數依賴於他們在轉換學院之時所建立的互助網絡，這種網絡是依照他們在西藏的區域性而建立起來的，來自同一個地區的年輕藏族打成一片一起生活而互相提供心理上與經濟上的協助，這二十年以來，在實質上這些群體建立類似親人的家庭體系透過這種地域性的團結精神，來自西藏各個地區新來藏族可在達蘭薩拉慢慢地發展經濟上可觀並穩固的根基，雖然沒有這方面的人口調查資料可以參考，我在達蘭薩拉時察覺到一個重要的人口轉變的過程，也就是所謂的舊人慢慢地往外地遷徙，同時新來者緩慢的湧進，官方對新來者的政策是培養他們不同面向的專業技術且在未來可貢獻藏族本身，並沒有要新來者留下之意，雖然如此，部分新來者仍然決定要留在達蘭薩拉，結果新來者在達蘭薩拉扮演的角色越來越突出。

第二節 外國人的身分

另外一個很值得關注的現象就是達蘭薩拉不斷地在增加的觀光客。這四十幾年以來，原來是一個貧困小鎮的達蘭薩拉慢慢地發展成一個很繁榮的商業中心，而且也是整個西北印度最熱鬧的旅遊聖地之一。任何對於達蘭薩拉的研究必須討論外國觀光客才可以完整的分析當地的特殊情境，在達蘭薩拉每走一步就可以看得到觀光業所造成的影響，因而，本節的焦點將轉向外國旅行者與達蘭薩拉藏族人口一直在變化之中的特殊關係。尤其有趣的是，1990 以來觀光這方面的發展，這個時候由於西藏問題在國際社會特別受到關注，外國來的人潮被吸引到達蘭薩拉來了，但是，將所有的外國人混為一談也是過度簡單化方向，就像當地的藏族與印度人人口一樣，外國的旅行者也是多元化的，許多外國人並不是一般的觀光客的身分，部分外國人其實對當地藏族文化也有既得利益。年輕的背包客通常只會待在達蘭薩拉幾天到幾個禮拜，他們與當地的藏族通常只有很表面的互動，這些較長期居住在達蘭薩拉的外國人反而很積極地跟當地人互動相處，因此他們對達蘭薩拉藏族文化的影響可說遠超過一般短期的旅行者，我將往來達蘭薩拉的外國人口分成以下四個種類：背包客、學佛的旅行者、藏族的友人 (friends of Tibet) 與進行研究的學者。以上的這種分類方式純粹是爲了達到分析上的方便性，這四種類的族群之間也有不少的重疊之處。

首先，讓我們對所謂的背包客提出幾個概括性的特徵，一般年輕低消費的旅行者，通常他們在印度花好幾月的時間到處旅行，但是在達蘭薩拉只會待個幾天到幾個星期，然後準備出發前往下一站，而且他們大部分只會在達蘭薩拉的天氣最理想的時候才會來，上面提過這就是春天的三月到六月與秋天的九月到十一月。我住在印度的那一年，離開達到里希克虛(Rishikesh)另外一個旅遊聖地去，到了五月的時候，每天達四十幾度這麼熱，外國的觀光客因而都往山上的方向跑，我認識的外國背包客中大部分人的下一個目的就是達蘭薩拉。達蘭薩拉吸引這麼多背包客的原因很多，譬如，涼快的天氣、舒適的民宿、適合外國觀光客口

味的食物等等，達蘭薩拉又是認識其他來自世界各國的背包客之好地方，到了當達蘭卡特等離藏族區幾公里之遠的小山莊生活，在那裡背包客聚集在一起吃香蕉鬆餅、抽便宜的大麻與在山坡上舉行過夜的舞會等等。少數的背包客也會做幾天的義工，不少的外國女孩跟當地的藏族展開一段羅曼史，除此之外，大部分的背包客與當地藏族之間的關係是很膚淺的。

第二種要討論的外國人是學佛的旅行者，全年其實都有不少的外國人留在達蘭薩拉學佛，然而在達賴喇嘛舉行法會的前後期，這類宗教旅行的人口最多，許多我認識的人每年固定會回到達蘭薩拉好幾個月，剩餘的時間他們在自己的國家存錢好準備下次的達蘭薩拉之旅，我認識了兩個來自荷蘭的夫妻，每年只在達蘭薩拉待三四個月，但他們仍然決定在當地把一個公寓全年租下來。部份學佛的旅行者也會在達蘭薩拉永久定居下來，有些到後來甚至選擇出家而變成和尚與尼姑。對藏傳佛教徒來講，達蘭薩拉的確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學習環境，附近有許多的僧院與寺廟，其中不少也提供以英文為教學語言的講座，由於學佛的旅行者真誠地對藏族宗教與文化感興趣，因此跟當地藏族就會產生較為親密的互動關係，不少長期定居下來的外國人花功夫在學藏文上。不過，在達蘭薩拉待久了之後，開始有人批評一般藏族欠缺對佛教的知識，他們也會對達蘭薩拉過渡觀光化的傾向表示不滿而懷念達蘭薩拉十數年以前的畫面，我認識一位英國人，這二十年以來已經往來達蘭薩拉十數趟了，他認為此社區正慢慢的在衰退之中，事情嚴重到除了他的老師以外他盡量避免跟藏族互動，然而，還有許多學佛的旅行者跟當地的藏族建立密切的友誼，甚至也會提供經濟上的協助。

接下來要討論第三種旅行者在此稱之為藏族的友人，這個群體的許多人在自己本國已經在參與藏獨的運動，他們來印度特定的目的就是在達蘭薩拉做義工而幫助當地的藏族，很多人來了之前已經把義工的工作安排好，有部分到了當地才開始尋找機會，他們進行各式各樣的義工任務，最普遍的便是當英文老師，有些人也會提供各種專業的技術，或著參與政治運動籌備與計畫。我接觸的案例便是，原本是西藏友人卻已對當地藏族社會不再著迷，例如，其中的一個澳洲女孩發現一個藏族的非營利組織中貪污與非正直作為的現象，該組織也不夠尊重他們的義工，在私人經驗上，她還曾遇過藏族男人向她求歡。不過，連在達蘭薩拉生活中明顯的矛盾現象都不會搖動多數藏族友人對於藏族運動的忠誠度，他對這個運動的熱誠很堅定，這也是構成他們自我認同的重要部分。一般來說，這群的外國友人十分地融入當地的社會，也很投入香格里拉般的形象之中，在外國人的期待與藏族的機會主義之對話中，所謂藏族的友人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列入討論的最後一個群體也就是研究學者，我在達蘭薩拉碰過了約有十幾個學者在做各方面的研究，多數為人類學的研究生。有著這麼多研究生住在他們的社區中，當地藏族已很習慣地被放在顯微鏡之下，許多我認識的藏族朋友被學者訪問過很多次，其中也有幾個曾當過口譯與研究助理。在進行研究的過程當中，學者努力跟藏族互動相處，盡量融入當地生活的各個情境，結果，他們常常在達蘭薩拉建立很親密的聯繫，部分也會變成藏族的友人為當地的社區努力做貢

獻。一些其他的學者則看得到達蘭薩拉社會的問題層面，我認識的幾個研究生後來放棄了在達蘭薩拉做的研究，他們決定到比較偏僻孤立的小藏族安置區繼續做研究，越深入的融入達蘭薩拉的環境越覺得當地的每一個人都有陰謀，並且發現我自己跟當地的藏族相處背後也帶著自己的心機，便是更了解他們的體驗好讓這些資料可以豐富我的論文。

以從西方來的消費者之身分，當我跟當地的藏族相處時，從頭到尾都覺得自己被分類為老外，當地藏族將西方人稱為洋及(Yinjee)，這是他們對於所有白人的總稱，我在達蘭薩拉永遠脫不了洋及的身分。這種感受讓我想到一個重要的問題，藏族對不斷出現的外國人有什麼樣的看法呢？在做這方面的研究時，De Voe提出了藏族對外國人的反應之幾種傾向，欽佩、機會主義與焦慮等等 (De Voe: 120)。¹⁹我在達蘭薩拉時，也看到了這幾種反應傾向的實證，藏族欽佩外國人有許多原因，譬如外國人來自很富有的國家，外國人可以在全球各地自由地活動，外國享有自己國家的主權等等。機會主義在達蘭薩拉也是十分明顯，很多藏族跟外國人做朋友其背後的目的尋找經濟的資助與申請到外國簽證的機會，這方面在接下來的兩段中將會做深入的討論。在達蘭薩拉藏族對外國人的焦慮不是很明顯，不過仍可以辨別，尤其是年紀較大的藏族認為這些來到當地的外國人十分不穩定及情緒化，也有人指出他們是尋求心靈協助的嬉皮，De Voe認為藏族對西方人稍微存有一些不尊敬的態度，並且認為自己的社會最優等，De Voe也認為藏族對學習藏傳佛教的西方人有著一種難已察覺但存在的輕視。²⁰在我個人的經驗中，我所聽到的藏族對於西方人的評鑑幾乎都是正面的，但是我的藏文尚未學到很高的程度，藏族對外國人較細微的感受也許是我察覺不到的部份，以西方人的身分而言，我反而更能感受及體會外國人對於藏族的態度。

長期跟達蘭薩拉藏族接觸的許多外國人批評當地藏族的物質化傾向，這種批評背後有很多原因，我們已經談過在西方所盛行的香格里拉神話的重要性，許多西方人期望藏族可以永遠的生活在現代化與資本主義的風雲之外，再說，在很多外國人的眼中，藏族與達賴喇嘛所提倡的藏傳佛教是分不開的，結果他們期待看到的藏族跟他們在達蘭薩拉所認識的真藏族之間的差異太大。²¹許多西方人(東方人也是)因為對自己國家之物質化與消費主義不滿意才會決定旅行到印度，到了印度，他們渴望的是一個在自己本國日常壓力以外的避難之地，諷刺的是，去了像達蘭薩拉這種地方之後有人發現，藏族與其他的被神秘化的族群居然比自己的同胞更著迷於物質與經濟的生活。然而，藏族的商人是製造氣氛的專家，他們在達蘭薩拉所製造的環境可以讓外國人得到他們渴望的想像，並滿足靈性上的欲望，一整套被神秘化的形象用來吸引觀光客，在當今的達蘭薩拉，外國觀光客可以學習藏族的按摩、瑜珈、繪畫、算命等等，有興趣者也可參加藏傳佛教短期密

¹⁹ Dorsh De Voe, "Survival of a Refugee Culture: The Longterm Gift Exchange Between Tibetan Refugees and Donors in Indi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1983), 120.

²⁰ De Voe, 126.

²¹ 筆者本身也不例外，剛到達蘭薩拉看到藏族的年輕穿著美國流行風的衣服時心理面居然有些適應不過來。

集班，同時在藏族的民宿、餐廳與商店消費。有些當地的居民也會諷刺地指出，達蘭薩拉已經變成了藏族文化的迪士尼樂園，在這樣子的過程當中，外人的期望與內部人製造的形象之間一直不斷地在對話當中，這種對話是造成文化變遷重要的因素。

第三節 印象操作 (Impression Management)

在群體與個人的層面上，來自國外的經濟資助對達蘭薩拉的藏族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上面已經提過，早期流亡的時候來自國外的經濟資助對藏族物質上的適應之關鍵性，到目前為止，來自國外的政府、慈善協會與個人的資助對藏族的影響顯著的突出，我住在達蘭薩拉的近八個月之中，就有好幾個藏族直接的跟我尋求經濟上的幫助，還有更多間接的暗示他們的需求。外人待在達蘭薩拉不久後就感覺到很多藏族住在當地的主要原因就是尋找外國來的資助者，在印度的其他的安置區邁向經濟飽和的趨勢之下，到達蘭薩拉尋找機會是一個自然的途徑。講到這點，我並不想要把達蘭薩拉的藏族描述為完全不顧其他的層面的機會主義者，以上已經提過，很多當地的居民因為遇到經濟困難的情況而被迫透過各種激烈的手段以達到最基本的生存條件，而且很多藏族對於過度依賴國外的資助這個問題持有批判性的態度，然而，文化依賴 (cultural dependency) 或過度依賴是本論文討論的一個重要課題，以下我將會盡我所能以客觀的方法討論此問題。

在這個段落中我在分析藏族與外國人之間的關係時，我會以獨特的取向進行討論，在很多書籍之中，藏族常常被描述為消極而被動的接受者，我在探討來自國外的資助此問題時，則會重視藏族的動員性。海外藏族，尤其是達蘭薩拉藏族，以一整套的策略方式而設法控制外國資助者對藏族與藏族文化的印象，在流行的談論中，藏族常常被外國的觀察者描繪成帝國主義、共產主義與民族毀滅等等的受害者(藏族經常也會對自己的民族做同樣的描述)，在本章，我將會把動員性還給藏族。顯然廣泛國際的趨勢對海外藏族的文化帶來了非常重要的影響，雖然如此，我希望本章能夠表露出海外藏族對其文化發展的方向也有動員性的決定權，這種權力的一個關鍵性的層面就是“印象操作”。²²以下讓我來分析一下來自國外的經濟資助與海外藏族往外的印象操作之策略，這兩者互相有關聯的現象對達蘭薩拉藏族的文化變遷與適應帶來了什麼樣的問題？

顯然地，最近幾十年以來藏族受到了國際社會高度的重視，海外藏族則享有一種高姿態的文化認同國際社會的重視也是海外藏族流亡於國外社會發展與成功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國際社會中，藏族享有的高地位並不是因為他們的被害、難民的身分而來的，假如這樣，土耳其的庫德族、盧安達的乎圖族(Hutu)等族群也會受到類似的國際重視，前幾章已提過西方人對於西藏的浪漫化與神秘化之意像，在這個部分，與其聚焦藏族在西方思想上呈現的香格里拉形象，我將會探討

²² P.C. Klieger, *Tibetan Nationalism* (Berkeley: Folklore Institute, 1992), 125.

藏族如何運用他們的形象來達到實質的利益。

接下來的幾頁，將深入探勘在達蘭薩拉的領導階層建構的廣大的一套文化形象，Toni Huber對過去的二、三十年以來將這樣的形象形容如下，回溯性與政治化的文化衍生之表徵，依賴著全球化的結構與文化資源的流動²³。很多學者將藏族所製造的香格里拉形象的動員性交給西方，如同剛才提到的，我試圖超越這樣的傾向指出藏族其實是在如此之過程中也具有動員性與決定權的參與者，以上提過的被藏族菁英利用與加以發展的文化表徵，必須放在藏族與外人間的對話脈絡之中而作分析，David Lopez雖然經常被控告否認藏族的動員性而將他們描寫成西方人想像中的囚犯，然而在接下來的引用卻可支持以上我所提及的這個觀點，「很清楚的是，動員性不管歸屬於藏族或著西方人，並非是固定的點或與生俱來的特質，而是交流循環的過程」。²⁴

從以上的觀察，我會將焦點放在十分重視保護傳統文化的這些達蘭薩拉知識份子怎樣利用某些現代的觀念如環境保護論與和平主義論為橋樑而將他們對文化的詮釋與現代化的脈絡連接在一起，藏族菁英之所以將藏族文化這種觀念提倡是因為在現代的環境之中，這些觀念具有共鳴的效果。接下來，我將會顯示文化表徵的提倡便是印象操作的策略之重要一環，並且以維持來自外國的資助湧進當做未來持續努力的目標。

按照位於達蘭薩拉的流亡政府之主張，他們代表全部藏族人口，包括住在西藏內外的人民，這種主張是否合法與正確並不是我想要討論的重點，不管怎麼樣，西藏流亡政府的說服力強到許多外國的政府與民間組織都把它當作領導海外藏族的合法性之組織，透過一個廣泛國際的體系，流亡政府很親近這些直接控制資助流動的團體與個人，如上所提的，流亡政府一直致力於維持這種角色。

在看流亡政府所出版的資料，讀者會遇到許多對於傳統文化的斷言如，「藏族基本上是和平與非暴力的人從未發展過自己的陸軍」，「環保主義是藏族文化與生俱來的層面」等等。²⁵以上這種的描寫並不會將歷史上的藏族文化延續到現在，反而會證明現代、國際化的概念對藏族的菁英怎麼樣提倡自己的傳統文化具有很大的影響，在接下來的幾頁，我並不要肯定或否定類似的文化表徵的價值與確實性，反而，在探討上面這種斷言的來源我認為可以察覺到類似這種文化表徵背後的成因。

一、文化表徵

值得提及的是，如同民族主義的新思想一樣，發展出新的文化形象背後的過程並不是從海外藏族一般的民眾當中激發出來的，相反的，這種形象就是西藏流亡政府的菁英本身發展的新概念，國際資助者對於海外藏族問題的關注必須要被

²³ Toni Huber, "Green Tibetans: A Brief Social History," in *Tibetan Culture in Diapora: Papers Presented at a Panel of the 7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ibetan Studies, Graz, 1995*, ed. Frank J. Korom (Vienna: Verlag der O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97), 103.

²⁴ Lopez, 184.

²⁵ Toni Huber, "Shangri-la in Exile," in *Imagining Tibet: Perceptions, Projections and Fantasies*, eds. Thierry Dodin and Heinz Rather (Sommerville, MA: Wisdom Publications, 2004) 357.

延續與刺激，世界上有很多難民族群比藏族更貧困而更缺乏物質上的協助，國際資助者是否了解該族群的真相已經不是重點，事實上，我已經表明出一概念，海外藏族並不是一個單一的族群，居住在南亞的藏族生活在各種各樣的情況之下，他們對自己文化的了解也是多元多樣，連達蘭薩拉的藏族人口都是很多元的，在轉換學院的這些新來的藏族與在印度出生長大的藏族之間的落差很明顯，儘管如此，流亡政府所提倡的文化表徵強調海外藏族的同質性，換句話來講，在藏族文化的推廣中，全部的藏族變成愛好和平的環保主義者²⁶，流亡政府主要關切的問題就是將國外進來的資源妥善分配到各個藏族社區，因此，應該被視為他們維持這種特殊角色的印象操作策略。

讓我們從環保主義在海外藏族社會的發展而切入這個問題的討論，從這個例子就可以看出來位於達蘭薩拉的藏族菁英怎麼將一些現代的觀念描寫成藏族文化與生俱來的部份，以下這段典型的例子是我在流亡政府的官方網站看到的：

在中國佔領西藏之前，西藏的自然生態很穩定，當時對自然資源的保護就是藏族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份。以佛教信仰中對大地互相依賴的元素為指導藏族與自然的相處很和睦。傳統佛教也有自我滿足的原則，就是環境應該被用來滿足人的需求而不是用來滿足人的欲望，這種信念也加強了藏族對自然環境保護的重視。²⁷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這一段中自然資源保護這個現代的觀念逆向地被推到了歷史上的過去，我已經討論過海外藏族社會面向過去西藏的傾向，連新發展出來文化形象都是如此，這樣對過去西藏的想像變成了追求未來目的的手段，在這樣的過程當中，環保主義與古老的藏傳佛教也被連結在一起，這也證明了這一段文字的作者欲將環保主義描寫成從古時候以來藏族文化固有而不變的特色。Huber認為海外藏族的“綠化”(greening)與更廣泛非西方土著民族發展環境保護意識的過程是息息相關的，這種現象最早的範例應該是北美洲的印地安人。²⁸佛教與環保主義的聯繫也並不是海外藏族特有的概念，在1970年代類似上一段達蘭薩拉藏族所描述的主張，早就出現在西方環保主義運動的圈子²⁹。事實上，Huber也表示達蘭薩拉藏族跟上環保主義的浪潮與其他的弱勢族群比起來算是很晚的，在1985之前，對於生態的意識與環境保護這種概念尚未出現在達賴喇嘛與流亡政府所發出的文獻，有趣的是，1980年代的前幾年，在流亡政府發出的小冊子裡面卻看得到藏族噴農藥與砍除森林的全頁照片。³⁰至今，當環境保護已經

²⁶ 這種文化表徵對一般的藏族，可說是一種的壓迫，也是機會主義產生的機會。

²⁷ 參看流亡政府的官方網頁，可以看到許多這方面的描述；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Desk. "Tibetan Environment: A Crucial Issue." The Tibetan Government in Exile.

<<http://www.tibet.com/Eco/intro.html>>(03/03/2007).

²⁸ Calvin Martin, *Keepers of the Gam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157.

²⁹ Huber (1997), 105.

³⁰ Ibid., 112.

變成藏族國際性的形象之重要層面時，難以想像類似這種的照片曾經在官方的宣傳中出現，而且已經被重新造林與藏傳佛教信仰反對農藥等運動取代，這是一種很有趣的現象，近年來發生的事情很容易被遺忘，但古老的過去一直被喚起，在海外藏族的情況之下，1959年前在西藏的過去是一個可以被塑造與操作的資源。

另外一個可讓我們追蹤變化的文化表徵之觀念便是和平主義，在他對 1950 與 1960 年代藏族反抗運動的研究之中 Jamyang Norbu 顯示流亡藏族已經將這段時間的暴力層面降低重要性而不加以強調，在他看來，對於圍繞著當時狀況的資料之短缺讓流亡藏族的領導階層有機會能夠重寫歷史，在這個過程當中武裝反叛的重要性被降低與忽略，再者，當時的反抗被描寫成一個非暴力的運動³¹，這就是 1959 年前西藏的過去被塑造與操作的例子。

在他對東方主義與藏族史中的暴力層面之方面的研究中 Eliot Sperling 也討論了現代概念(如環保主義、人權主義與民主主義等等)被逆向推動到過去這種時代錯誤的傾向，Sperling 指出藏傳佛教對於保護教義的概念其實曾是追求政治權力的工具，並且這種概念經常被用來合理化暴力的手段。³²這跟當今達賴喇嘛與流亡政府所提倡類似甘地主張的和平主義(ahimsa)是不合適的觀念，如環保主義的例子一樣，現代的發展被描寫成藏族文化與生俱來的重要層面，很清楚的，就如環保主義的例子，藏族和平主義是對過去的重新詮釋，也可以說是對歷史的扭曲，由於當今國際社會的觀念與期望，很容易可以看得出來，將藏族描寫成環保主義者、和平主義者、民主主義者與男女平等主義者等等的功利所在，這種觀念可以提供文化上的槓桿作用，在藏族的實例中也是維持與刺激外國資助者對西藏問題關注的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環保主義與和平主義也許僅是一些達蘭薩拉的菁英所製造的虛構文化表徵，但是這些概念對於一般達蘭薩拉藏族的自我認同有很重要的影響，並且也會影響他們怎麼樣對外國人表示自己的文化，換句話來說，在制度性的層次所進行的這種更廣泛的印象操作之策略從上而下進而變成一般人民尋找外國資助的重要手段，部分學者認為上流社會所創造的文化表徵對一般住在南亞的海外藏族之影響並不大，而且對西藏內地的藏族幾乎沒有影響³³，我自己待在達蘭薩拉的時候，反而發現了在藏族與外國人的相處模式之中，以上所談的這種文化表徵十分突出，尤其是住在達蘭薩拉的年輕人特別容易受到影響。在以下這一段，我將會分析印象操作與外國資助的個人層面，在此，我的推論主要以自己所察覺到的事項為基礎，透過對達蘭薩拉各個層級的藏族之間之互動，我將描述印象操作在一般當地的藏族適應達蘭薩拉生活的重要性。

二、個人層面

³¹ Jamyang Norbu, "Exile: Resistance and Diplomacy," in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Tibet*, eds. Robert Barnett and Shirin Akiner (London: C. Hurst & Co., 1994), 188.

³² Eliot Sperling, "Orientalism" and Aspect of Violence," in *Imagining Tibet: Perceptions, Projection, and Fantasies*, eds. Thierry Dodin and Heinz Rather (Sommerville MA: Wisdom Publications, 2001), 319.

³³ Huber(2001), 359.

西藏的歷史上，資助者與被資助者之間的關係是一個很重要而且很複雜的問題，在藏族流亡到印度之前，宗教當權者與整個政教合一的政權就經常從外國資助者受到資助而得益，在西藏之內，宗教體系之所以這麼發達就是因為西藏的俗世人口給予的經濟與物質上的資助，在這種情況之下，接受資助原本只是限於宗教人士的特權，但是，在現今海外藏族社會之中所有的藏族，不管是僧人或者俗人都以一樣可以扮演接受資助的角色，所有的好藏族接受來自外國人的資助已經被合理化，也被當成一種理所當然的現象。³⁴上一節我已經討論過藏族商人利用香格里拉般的形象吸引觀光客到他們所經營的商業範圍，而不選印度人開的商店，我在達蘭薩拉也發現了上述提到的文化表徵，在這樣的環境之中，被一般的藏族當作尋求經濟資助的彈藥，許多天真的觀光客落到這種圈套之中。我在達蘭薩拉期間當過幾個尼姑的英語家教，我曾經問過我的學生她們對外國觀光客的看法如何，其中一個對我說，「我們也很喜歡這些外國人，因為他們會給我們帶來資助，也對我們的文化很有興趣」³⁵，其他的尼姑顯然地對她這種直言不諱的回答頗有成見。

在達蘭薩拉經濟資源與工作機會的分配極為不均，因而許多僧人與俗人都一樣，假如沒有受到經濟上的協助幾乎很難在當地存留下來，尋求外國資助這個方法是提昇社會地位最快且最有效率的手段，許多原本定居在達蘭薩拉的藏族與他們的後一代在印度已經共同打下了頗為穩定的經濟基礎(這也跟長久以來外來的經濟資助有密切的關係)，他們也享有廣泛親屬網絡的支援，實際上，住在國外的親戚寄回來的匯款也是很多人收入的重要部分，但是，在貧富不均的實際情境之下，對於許多比較貧窮的藏族來說，尋求外國資助的確是改進生活條件最佳的機會，在許多當地藏族看來，找到外國資助者與移民國外的機會可以立即解決他們生活在達蘭薩拉所面臨的困境。

值得提起的是，大部分我認識的藏族朋友很願意分享他們的經驗，而並不會刻意地利用一些虛構的文化表徵來追求個人的利益，許多人也對流亡藏族的社會對於外國人的過度依賴這個問題持有批判性的態度，我的朋友常常對我抱怨很多藏族喜愛佔外國觀光客的便宜，而這樣會破壞當地藏族的形象，他說很多年輕的藏族不願安份工作，只會混在市場上，他們完全依賴這些慷慨的外國人施予的資助，並且也不會主動的站出來改善自己與自己的社會，文化依賴這種發展的趨勢是很多藏族所關心的一種惡化循環，許多觀察者，包括藏族與外國人在內，將達蘭薩拉人道德上的衰退跟外國資助的易取性聯想在一起。

另一位提供資料者的立場更為激烈，他認為不管是住在印度或者西藏的藏族，首要成功他們的目標之前就是先切斷所有外來的資助，只有自己本族的行動才可達到最終的目標。雖然很多藏族對於依賴外人文化這種傾向持有批判性的態度，並且支持自給自足的文化發展，但是在實際的現況之下這樣子的轉變難以實

³⁴ 達蘭薩拉藏族流傳著一個笑話，一個和尚與一個外國人到同一個房間，當和尚從房間內走出來時，腳上穿了一雙新的耐吉(Nike)鞋，Diehl, 118。

³⁵ 我4月13號在Jamyang Choling尼姑院為她們上英文課時，其中的一個尼姑提供了如上的意見。

現。一方面，流亡政府主要扮演的角色便是外國資助的延續與重新分配，以上已經提過，這種制度性的基礎對個人層面就沒有辦法帶來鼓勵作用。另外一個問題也是上面常常提過到一個重要的概念，多數的藏族將達蘭薩拉視為一個短暫棲息之地，而不願意投資建設一個永久性與健全的社區，這種不穩定的心理狀態的背後有許多因素，譬如，1994年暴動時印度人向藏族表現的仇恨³⁶，季節性的遷移為主的經濟，強調過去而不關注在印度的發展的這種意識形態等等，這種環境當中，怪不得大部分的藏族不願意投資於達蘭薩拉的未來，在我看來，只要達蘭薩拉的藏族繼續將此地當成短暫的交流站，對於外國資助者的依賴只會愈來愈深。

第四節 移居他國之策略

對於大部分我認識的藏族來說，達蘭薩拉只是一個短暫的避難所，這個小鎮是前往其他地方的中繼站，在此地，藏族可以實現跟達賴喇嘛見面的夢想，而且生活在達賴喇嘛所在地的附近也給當地的藏族帶來一份安心，不過連達賴喇嘛非凡的魅力也沒辦法讓這些藏族永久的定居下來。早期，跟著達賴喇嘛逃往印度的原本藏族居民當時從未想過將會在達蘭薩拉一待就是四十多年之久，對他們來說，返回西藏很清楚地是對未來的期望，四十幾年，返回西藏的渴望一直受官方的重視，並且是一般民眾適應於異國生活的重要策略，但是，筆者在達蘭薩拉的時候觀察到這方面一個新的發展，在這一段，我將會討論海外藏族社會中非常重要的另一種傾向，對未來希望的方向正在轉變當中，當今，對許多藏族來講，受教育、加強語言能力、攀關係與尋求外國資助者等等優點吸引了很多藏族來到達蘭薩拉，但是來到本地最終的目標並不是準備返國，而是尋求移民到西方國家的機會。

自從 1960 年代以來有川流不息的藏族移民到瑞士、挪威、澳洲與加拿大的西方國家，一直到最近十幾年以來才有大量的藏族移民到美國去。自 1990 年以前到美國生活的藏族僅限於一些喇嘛與學者，接下來，美國與西藏再定居的計劃 (Tibetan-US Resettlement Project) 1990 年時被美國政府的國會批准之後³⁷，海外藏族渴望的移民對象從歐洲轉到美國去了，該計畫也對達蘭薩拉的文化變遷有更多的影響。這個再定居的計畫提供給一千位海外藏族永久居留的簽證，好讓他們可在美國定居，這個計畫原來的目的是給居住於全南亞的藏族有機會拿到簽證，事實上被選出來的約有一半是達蘭薩拉的藏族。³⁸到目前為止，透過長期的家庭重新團結 (family reunification) 的過程後，超過一萬個藏族人民從尼泊爾與印度移民到美國去了，結果，許多還在南亞的藏族跟生活在美國的親戚朋友建立了

³⁶ 許多達蘭薩拉之藏族向我表示，他們擔心未來達賴喇嘛涅槃之後，印度人不會讓藏族繼續待在達蘭薩拉。

³⁷ 1990 年，美國國會移民法的第 134 條。

³⁸ Amy Frechette, "Statelessness and Power. Transitional Entitlements among Tibetans in Exile in Kathmandu Nepal"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1997), 235.

跨國性的聯繫。雖然說這個再定居計畫原來的動機在於推廣與保護傳統藏族文化，但是該計畫在達蘭薩拉也製造了另一種新狂熱的現象，幾乎所有我在達蘭薩拉認識的藏族正透過各種方法尋找一個機會到美國(或其他的西方國家)去，在下來的一段，讓我們來討論美國西藏再定居計畫的背景與實施的過程，接下來，也會分析該計畫對達蘭薩拉藏族文化的影響之深度。

一、美國西藏再定居計畫(Tibetan-US Resettlement Project)

美國西藏再定居計畫的創始人是當過紐約市移民事務局的董事長Ed Bednar。Bednar知道在美國法律下藏族得不到難民身分(refugee status)的簽證，因此他希望藏族可以從原來居住地離開族群(displaced people)的身分申請到美國簽證，再說，Bednar並不尋求美政府經濟上資助，他的目的只不過是得到一千個永久居留簽證給所謂地“拋錨親戚”(anchor relatives)。³⁹他的計畫如下，先讓原來一千個藏族同人民定居在幾個城市而建立藏族的社區(cluster communities)，原來的移民也受到尋找工作機會的支援、短期的住房與語言訓練等等的協助，接下來，當原來的移民已經安定下來後，在美國移民法律的家庭重新團結之條款下，還遺留在南亞的親戚可以順利地申請到前來美國的簽證。Bednar提出的計畫在1990美國國會通過的移民法案所謂「西藏條款」(Tibet provisions)下受到美國政府肯定。不過，美國國會也小心翼翼地避開了可能會引發的政治爭論，當時紐約時報的報告描述如下，「該法律並不把藏族描寫成難民，因此避免了可能會惹上北京生氣的敏感話題」⁴⁰，從而所謂西藏條款的通過與西藏美國再定居協會(Tibetan-US Resettlement Committee)⁴¹建立了之後，這個計畫將在達蘭薩拉造成嚴重後果的過程正式啟動。

西藏美國在定居協會發出的小冊子中，提供了對該計畫的目標如下，「為了將現代世界中的一個獨特文化延續下來的目的而發展教育、經濟與科技的資源，並且讓一千個大使來到美國加以確保西藏未來的持續生存」。⁴²不管這個計畫原來的好意在於何處，接下來選擇人選的過程在海外藏族社會造成了許多衝突與爭吵，一個居住在尼泊爾的海外藏族對這個狀況的描述如下，「每個機會應該都是平等的……但這些達蘭薩拉的藏族都最先享有優惠，要等到最後期限與經過公告後才會傳到尼泊爾，但經過作業程序後讓這些具備條件的尼泊爾藏族根本沒有機會，這一千個去美國的人選也是一樣，大部分的機會都被達蘭薩拉的藏族拿走了，因為這些機會總是被內定給自己人，大部分住在尼泊爾的藏族根本不曉得有這樣子的計畫」。⁴³許多居住在達蘭薩拉以外的海外藏族早因為對達蘭薩拉藏族獎學金、就業與其他機會不均等的分配而累積了憤恨，加上這個西藏美國再定居計畫人選的爭論更是火上加油。

³⁹ Hess, 87.

⁴⁰ Ibid., 88.

⁴¹ 這個協會是一個聯合幾個義工團體的網絡。

⁴² Frechette, 194.

⁴³ Ibid., 192.

在西藏美國再定居協會與西藏流亡政府打成的協議之下，流亡政府的內政部 (Home Department) 負責了選擇人選與分配簽證地工作，以公平性為考量，一套以人口統計學的特徵為根據的名額被發展出來，譬如，75 份簽證分給已經有親戚住在美國的藏族、825 份簽證分給居住在印度的藏族、100 份簽證給居住在尼泊爾的藏族、200 份簽證給尚未穩定居住且尚未受過政府協助的藏族、100 份簽證給最近從西藏過來的藏族、200 份簽證給教育程度高或者有專業技術的藏族、100 份簽證給曾經當過流亡政府官員的藏族、100 份簽證給曾經替流亡政府作社會服務的藏族等等。只有 100 份簽證給政府官員，不過已經有親戚在美國、有較高的教育程度或專業技術與替政府做社會服務的人選最有可能就是政府的官員，因此 500 多份簽證事實上已被流亡政府所預訂，再說，來自達蘭薩拉的申請者遠超過任何其他的地方。⁴⁴當我在流亡政府的內政部詢問的時候，他們無法提供有關這些被選上的人之前居住地的資料⁴⁵，雖然缺乏可證明數據，我們仍然可以推測被選上的人當中極不均衡的數量便是當時居住在達蘭薩拉的藏族。

1995 年，原來一千個移民之配偶與未婚的孩童已經具備必要的條件申請家庭重新團結的簽證，按照美國的移民法規定，等待家庭重新團圓有四年之久的期間，因此，到了 1995 與 1996 年又有好幾百個達蘭薩拉的藏族實現了移民到美國的梦想。西藏美國再定居計畫長期的過程結束之後，許多還留在達蘭薩拉的藏族對於未來的期望已經轉向美國之夢，無疑，1990 年以來達蘭薩拉藏族對於未來的希望與動機經過了巨大的轉變，未來機會的結構也在變化當中，越來越多的藏族往西方的國家流動，多數人對於達蘭薩拉未來的發展很沒有信心，對許多人而言，這個小鎮只不過是短暫的交流站，下一站並不是西藏而是西方的國度。接下來這一段，描述我個人所看到的多種事件，顯示了對於很多居住在達蘭薩拉藏族而言，移民到西方國家的美夢也是適應日常生活的重要手段。

一、個人移民他國的策略

我的朋友 Dorjee 2001 年到了印度，在達蘭薩拉附近的轉換學院學習三年之後，他搬到達蘭薩拉來，他學校的學長當時在達蘭薩拉開了一個藏族料理烹調的教室，聽說他的學長也是經由上一代另一個學長的傳承接下了教室的生意，然後再轉繼傳給我的朋友，因此 Dorjee 是這個教室第三代的烹調老師，Dorjee 的學長後來娶了一個美國的妻子便離開了，聽我朋友解釋，他現在在美國紐約州當卡車司機，據我所知他也定期匯款給他還留在達蘭薩拉的朋友。這個例子，讓我們發現，跟外國人結婚其實是移民到西方國家其中的一個策略，在藏族流亡到印度之後，內婚是保護文化邊界的重要手段，當今藏族與印度人或外國人結婚並沒有受到社會肯定，但是已經慢慢地變成了可以接受的行動方針。事實上，在達蘭薩拉“護照狩獵”的狀況常常發生，有天晚上，我與藏族朋友坐在酒吧喝啤酒時，他們跟我分享了一個故事：據說一個年輕的藏族女孩跟一個上了年紀的美國先生

⁴⁴ Ibid, 195-196

⁴⁵ 而且筆者在詢問這方面的問題時，該部門的官員投以愛理不理的態度。

在達蘭薩拉結婚了，他們在達蘭薩拉一起住了近一年的時間等著新娘簽證申請手續皆通過後搬遷到美國去，然而到了機場時，新娘卻突然消失了，原來她等在機場的藏族男朋帶她逃跑，她受到在美國已安排好的藏族社區之庇護而與她的藏族男友定居下來，當然，這個故事的可靠性是可疑的，但是仍然可說明達蘭薩拉藏族社會發展的傾向。另外值得提及的是，近來我收到了朋友 Dorjee 的好消息，他現在與他的西方老婆正住在英國。

以美國人的身分生活在達蘭薩撒拉，我本身也有發生過幾次被請求的經驗。當時我認識了一個尼姑，她已經在達蘭薩拉住了十多年，剛到了達蘭薩拉時，她在尼姑院住了一段時間但一直不習慣，過了八年以來她自行在外租了個房間，由於經濟上的不穩定好幾次被迫搬家，我曾問過她生活費怎麼付，她回答說達賴喇嘛(流亡政府)每個月給他一千盧比，另外一個她從未見過的加拿大人每個月也給他兩千盧比的資助，我與她進行了幾次語言交換後才開始對她的生活有些了解，她每天生活的重心便是做語言交換與到英語教室上免費的英文課，有天我在市場的路上碰到她，當時她匆忙的對我解釋她兩天來都在找我，並且繼續表示最近有個機會到美國尼姑院住幾個星期，她唯一缺乏的證件便是一個美國公民寫給她的邀請函，她請求要我住在美國的兄長寫封信給她並在邀請函中陳述他在這十年來一直是她的資助者，顯然地，我並不會要求兄長參與任何不當的行動，我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委婉地拒絕了她的請求，意外的是，我被這個經驗震動不已，感覺上我跟他之間的信義關係已經被違反，再次，我被提醒了在達蘭薩拉的每個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有企圖心。提出這個例子的目的並不是為了侮辱來自達蘭薩拉的宗教人士，這個例子反而說明了在當地展開的方向，與我不同的是，許多外國的觀光客很樂意盡他們所能幫助達蘭薩拉的藏族申請前往西方國家的簽證，外國人的好心卻是火上加油，對這個小尼姑與許多其他想移民到西方的藏族而言已經變成一種壓倒性的慾望。

我在達蘭薩拉的認識一位年輕的朋友 Gonpo，他在 2002 年到了印度，他在德拉頓的藏族高中就讀，趁寒假期間到達蘭薩拉探訪姐姐，在我的印象中，Gonpo 是一個誠懇又勤勞的年輕人，我從他敏銳的解說中學到了很多有關海外藏族的事，他提到，高中畢業後，他很希望回到老家西寧，但是卻又擔心找不到工作機會，尤其是他在印度所受的教育在中國並不被承認，這是很多達蘭薩拉藏族憂慮的問題，並且是多數人拒絕歸國的因素之一。他也提及了他的很多朋友在印度念大學，他也知道在大陸時印度大學的文憑派不上用場，結果，他認為未來唯一的選擇便是到西方的國家念大學，最好的地點便是美國，這樣他有強大的信心可以在西寧找到好的工作機會。另外 Gonpo 也提到，藏族拿印度的護照回西藏其實很危險，很有可能會被中共的警方找麻煩，然而攜西方國家的護照回西藏則很安全，中方不敢牽涉。在以上的例子中，這個年輕的藏族朋友說明了另外一個重要的概念：對許多海外藏族而言，移民到西方國家也是可以安然返國探親的一個管道。

我的另外一個年輕友人 Tenzin 來自拉薩市，認識他兩個月之前才剛抵達達蘭

薩拉。他表示，父親過世後，他被他的母親送到印度，母親便堅定的教導他前往達蘭薩拉時要找尋外國資助者與移民到西方國家的機會。不幸地，我認識他時，他對我說，「我都找不到Sponsor了」(Sponsor是達蘭薩拉藏族對外國資助者的總稱)。⁴⁶Tenzin希望將來有機會到西方國家去，但是他顯然地對於海外藏族尋求外國簽證的複雜性不很明白。不可置疑的是，過了幾年的時間，Tenzin慢慢地摸索到在達蘭薩拉錯綜複雜之環境中的生存之道。從以上數個例子可以察覺到遷移他國問題的另一個層面，移民的狂熱已經擴散到西藏內部，在我的印象中，像Tenzin一樣許多新來的藏族流亡到印度的原因並不是尋找宗教或政治自由，更不是為了參與藏獨運動，反而是尋求更實際的目標，也就是生活在西方國家的富裕與安定。

其實我碰到的類似故事多到可以寫成一本書，希望上面談過的例子能夠突顯幾個廣泛的問題與其過程，由於政府進行的計畫、家屬已經在國外定居、外國人私下的協助等因素，對於許多達蘭薩拉藏族來講，移居他國已是一種強烈的欲望，並且對於困在達蘭薩拉藏族的日常生活也帶來了非凡的影響，當越來越多年輕有能力的藏族移民到西方去。移民狂熱這種現象指向一些很有趣的現象；一方面，長期以來，保守與僵硬的思想必須適應於現實條件，這麼多年以來，難民身分與返回西藏這種概念被維持下來，後來，流亡政府親身安排了上千個藏族遷移到離西藏更遠的國家之單程票，這種舉動被合理化：這些藏族可以將有關西藏的訊息傳給全球的人。當權威性的談論經過了轉變，一般藏族對未來的期望也在變化當中，當海外藏族社會往外擴散之時，一種新興的文化意識正在浮現當中，接下來的第四章中，我將透過離散的理論針對這種新興的趨勢做進一步的分析。

⁴⁶ 1月中，我在印度人開的小吃攤認識Tenzin，接下來，每幾天在路上碰面聊天。